

论雍正帝相度“万年吉地”的几个问题

林 乾

内容提要 该文依据清朝满汉文档案，对以往有关雍正帝打破“子随父葬”之制、另辟陵区，以及在直隶易州建造泰陵的时间和原因等问题重新进行探讨，考证出雍正朝最早于雍正三年初正式启动帝陵选址事宜，并初步确定遵化州九凤朝阳山为万年吉地，但经过多年、无数次的审慎查勘论证，雍正帝最终采纳高其倬等建议，放弃九凤朝阳山改在易州建陵寝，风水形胜实为主要原因。

关键词 雍正帝 万年吉地 相度 年代

清史学界围绕雍正帝何以打破“子随父葬”的陵寝制度、避开东陵另选西陵，历来颇有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雍正有意回避他的父亲康熙帝（景陵），是雍正夺嫡的间接“证据”之一¹；还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雍正帝以己为中心，自我夸示，不甘落于祖、父之后的体现²；也有学者专门从风水的视角进行考察³，但显然难以解释为何乾隆帝的裕陵又选择在东陵建造？⁴本文主要依据清朝满汉文档案，对相关问题予以澄清。

一 雍正帝相度“万年吉地”的时间

关于雍正帝何时开始相度其“万年吉地”，学界多认为：雍正四年以前，因处理年羹尧、隆科多等大案，无暇顾及“万年吉地”事宜，故最早为雍正四年⁵。但这与档案不符。

档案文献表明：最迟雍正三年初，雍正帝亲自下旨，安排陵寝选址事宜，并初步选定遵化九凤朝阳山为“万年吉地”。此事由怡亲王允祥牵头，参加者主要是钦天监官员及精通堪舆之人。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六日，钦天监监正明图面奉谕旨，同兵部侍郎傅鼐、总兵官许国桂带领相关人员前往

〈1〉 戴逸：《雍正践祚之内情》，《中华读书报》1999年3月24日。

〈2〉 孙大章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五卷页282《清代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

〈3〉 冯建速：《清代陵寝的选址与风水》，王其亨主编：《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

〈4〉 杨珍：《顺治亲卜陵地与雍正另辟陵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4期。

〈5〉 徐广源：《清西陵史话》页10，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耿左车、邢宏伟、那凤英：《清西陵档案解密》页26，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

遵化州等处相度吉地。明图随即升任内阁侍读学士，仍兼钦天监监正。一个多月后，明图等一行从遵化州回京，由怡亲王带领，共同向雍正帝覆奏相度吉地之事¹。

这是目前档案所见雍正帝相度万年吉地的最早记载，也是正式对陵址的实地考察，并向雍正帝进行了奏报。

这次相度的陵址就是遵化州的“九凤朝阳”山，距遵化州城北侧二十里之间，“龙身长远，地势雄伟，能增万年寿数，能衍广运无穷”。其后，礼部尚书赖都等向雍正帝奏请：由钦天监勘测地形，分订禁令，择卜吉日，设立红桩；诸项工程事项，交付工部，查例具奏。奉旨：依议。九月二十日，礼部等开列应遣大臣等职名，奏请钦点，包括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领侍卫内大臣马武，大学士马齐、嵩祝，以及八旗各都统，吏部、礼部、兵部、刑部、理藩院等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雍正帝朱批：著派嵩祝、李永绍、傅鼐等前去²。

嵩祝本在开列的大学士职名中，李永绍是工部尚书，原不在开列职名中；傅鼐为兵部满侍郎，也不在开列职名中。钦点李永绍是涉及工程等事项，而钦点傅鼐因为他前期参加相度事宜，熟悉情况。

这份满文朱批奏折说明，由钦天监主导的选址工作已基本确定，并划定保护范围，颁布禁入法令，因此礼部开列职名涉及数十衙署的主官，而雍正帝钦点工部尚书，说明已进入“择吉”开工阶段。以上档案说明，雍正帝最初相度吉地，确实在遵化州，与顺治帝孝陵、康熙帝景陵相距颇近。

帝王陵寝有“三年选址，十年定穴”之说。按礼部所奏，接下去应该进行工程方面的各项准备，而“定穴”无疑是重中之重。问题恰好出现在“定穴”中，官员有较多意见分歧。

雍正四年正月初七日，怡亲王允祥传雍正谕旨：着许国桂、李楠等往遵化州看九凤朝阳吉地。许国桂时任正红旗汉军副都统，李楠原任总督河道中军副将，两人接旨后即会同钦天监监正明图等人一同来到九凤朝阳山上，他们用罗盘“逐节对星”，因为没有携带“筒平仪”，“癸宫、庚子分金坐在何处，一时不得其的，容查明补奏”。

在堪舆学中，唐宋以来主要有两派，即形派和理派。而清代最重形派。“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象，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而他拘泥在所不论，今大江以南无不遵之者”。因形派以江西人为主，活动也主要在江西，故又称江西派³。

由于理派“纯取八卦五星以定生克之理”，颇为玄奥，故清代帝王陵寝选址中，形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主导性作用。光绪朝《大清会典》载“择地之术”称，“以地势之起伏，视其气之行，以地势之廻绕，视其气之止”，“其精微之旨，尤致详于龙、穴、沙、水”⁴。叙述的也主要是形派的观点。龙、穴、沙、水加之定向，俗称地理五诀。龙者，地之生气，龙止则为穴，龙脉即山的走势。穴的本义是土室，即金井（棺槨）所在的位置，龙脉的来向和穴位间的关系，也就是将来陵寝建筑布局的中轴线，要通过罗盘上八干四维十二支的二十四山

1 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下不注明）雍正三年六月十八日，明图奏。

2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日，《礼部尚书赖都等奏请钦点勘测地形官员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页1214—1215，黄山书社，1998年。

3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九《子部一九·葬书解题》，中华书局，1983年。

4 《大清会典（光绪朝）》卷八一，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

向，定为“某山某向”。沙，也作砂，是指砂山，形成对穴区的环抱、拱卫之势¹。

相度官员在实际勘查中，发现龙脉不错，从大势上看是吉壤。“龙身金星弘伟”，“案内明堂舒畅开阳，案外大堂规模弘阔，八面罗城环绕周密，堂局极大，诚为大势”。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的问题是，“气势似觉平缓”，不但“龙沙低伏”，且“案山树亦宜去，令其明净。大龙上之边墙，亦宜拆去，以全五行自然之体。以上种种不甚惬意之处，亦书中所云山川小节之疵也。”这就是说，此处吉地有不少缺陷，故“伏乞皇上广选贤能，再将此地细加考正，庶几尽善尽美”。此奏由许国桂、李楠联衔上奏，并强调明图等皆未署名²。这说明相度官员对“吉地”存在明显分歧。

果然，此时已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仍兼钦天监监正的明图，于同年二月初五日单衔上奏，密奏许国桂、李楠与相度官讨论情形，特别是对许、李提出的疑虑，堪舆官如何一一释疑、解答，也让我们了解到有更多人参与到“定穴”工作中：“本年怡亲王传旨：着臣同副都统许国桂、李楠、崔辅鼎、任泽善、马元锡、吴立、艾芳等于正月十八日起身，前往遵化州相度九凤朝阳吉地。至二十二日，公同详审，仔细斟酌。”尽管精通堪舆的相度官一一回答了许国桂、李楠等官员的疑虑和质疑，但在最关键的尝试“定穴”时出了大问题：“据许国桂欲立癸山丁向，兼子午三分，相度官即照彼所议下盘，立桩牵线，其向大偏东南，在青龙山脚之内，正水道出口之处，堂局全无。”

清代陵寝的方向也是“南向为尊”、“南为正向”，但正向往往与龙脉不相吻合，因此通常采用南偏东或南偏西，从而与龙脉浑然一体，许国桂欲立“癸山丁向”，就是为了弥补这种不足，但随之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即相度官据此定穴，正冲水口，所有建造物无法建造，即“堂局全无”。

帝王陵寝不但要讲“风水”，还要满足建筑物所承载的礼制要求，这在明清陵寝中表现得最为突出³。“堂局全无”就意味着无法进行起码的建筑布局。这是陵寝建筑最根本的缺陷。

精通堪舆的吴立、艾芳等人的解释是，“据书定局立向，再四审详，果系大龙大局，体势尊严，规模宏大，寔万世无疆之吉兆也”。但并不能消除许、李等人的疑虑。明图上奏称：“该臣看得雍正三年二月臣奉命率领相度官等前往遵化州地方看得九凤朝阳吉地，咸以为龙飞凤舞，孕结天然，率土欢腾，官民共庆。但山川之变化无穷，地理之精微至奥，相度官不过据书立论，今许国桂、李楠等所论微有不同，不可不详求至当。伏乞皇上敕下九卿大小衙门，有精通地理者，遣往印证。务使斟酌万全，百不失一，永定万年之吉兆，祥开不朽之弘基。”⁴

以上两份密折，尽管钦天监趋向于相度官的意见，但显然不能消除许国桂、李楠等人的疑虑。而无论是许、李两人的联衔密奏，还是明图的独自上奏，都明确奏请广选贤能，再加考证。说明雍正三年二月选址九

1139。

2139。

3139。

4139。

凤朝阳山取得的共识，乃至“官民共庆”，是当时尽人皆知的“好消息”。但在四年二月具体定穴时，却出现较为严重的意见分歧。这正是高其倬、管志宁两位精通堪舆者其后多次前往相度的背景。

二 放弃“九凤朝阳”吉地的原因

从档案可见，高其倬最晚于雍正五年进京，由怡亲王带领相度九凤朝阳山（也写作五凤朝阳山），其相度情形当面向雍正帝奏陈外，也曾具折上奏，但高其倬随即回任福建总督。在此前后，在江浙一带看风水的江西人管志宁被召到京，也被派往相度九凤朝阳山，清廷不久特授他为户部主事，这即为工作上的便利，也说明要长期借重其堪舆学的实践经验。雍正五年冬，管志宁告假回籍，六年二月再度来京，此次相度不限于遵化的九凤朝阳山，而是扩展到直隶一带，包括易州贤德庄等地。这说明没有受“子随父葬”观念的拘束。

最初，高其倬和管志宁是分别前往相度的。就二人而言，在堪舆学上各有千秋。由于高其倬的总督身份，雍正当然更相信他，而对民间的堪舆家也不排斥，说明雍正帝对“万年吉地”的高度重视，并采取开放态度。转眼到了雍正六年，“万年吉地”选址工作不能再拖下去。六月二十四日，雍正命管志宁于立秋后驰驿前赴福建。一个月后，闰七月二十七日，高其倬接奉怡亲王谕：“前者五凤朝阳山万年吉地，经总督看过，嗣有江西管志宁看后，有旨意问过总督，总督亦曾奏过，虽然奏过，尚有未明白处。”

由于高、管两人不是同场相度，怡亲王按照雍正帝的旨意，令管志宁到福建与高其倬当面讲论，特别传旨谕高其倬：“总督还是明理之人，若人之言不是，决不附和以为是，若人所言有理，亦决不胶执己见而以为不是，彼此讲明白，方于事有益。况此事甚大，令本府带信与总督”，“事完之后，总督即明白具奏，令管志宁驰驿回京”。雍正此次下旨就是让二人当面辨正，以便他最后定夺。

管志宁于是年九月初七日到达福建，高其倬不但与之“考论十余次”，为“验证”管志宁的堪舆理论，高其倬还令其现场指证十余处。两人还一同到福建一家出了五名尚书的坟地进行现场查验。

十一月初五日，高其倬同日连上两道密折，一折是他考校“管志宁学问、眼力所到”；另一折是两人反复推敲“五凤朝阳山”的基本结论。

关于管志宁的学问、眼力，高其倬奏报说，管志宁所学“遥宗唐杨益之书，而专遵宋吴仲祥《望龙经》及其女之《解议》二书，又参以宋廖禹之《四象》，其近派之专师明之雪庵和尚，于审龙消息捉穴形象，另有师授，加以阅历”。“臣又与管志宁登山数处以试其眼力”，结论是管志宁不但学养深厚，“且看地年久，阅历颇多，乃系历练之人”。因管志宁到直隶后，所到之处不多，高其倬又将“直隶山水来去之大势，回环之情形，皆详细说知”，最后，并将他向来所见认为可以寻看之处，详细说知，以备管志宁酌采。由于高其倬任职福建总督，属于海疆要地，不能长川在京，故清廷让管志宁在更广范围相度。这就是最终选定易州的由来。

杨益乃唐代著名形派大师，寓居江西，所撰《疑龙经》、《撼龙经》等书，很有影响。高其倬奏称：“臣向来专宗杨益之《疑龙》、《撼龙》二书，而于认星定穴之要，未得精微，是臣不能自信之处，在管志宁以为其于胎伏中讨消息之法，即是臣所疑之处。”廖禹乃宋代著名堪舆学大师，师承杨益。雪庵和尚是明代峦头派的代

表人物。尽管高其倬与管志宁所学不尽相同，但都以杨益为宗，都属于形派则无疑¹。

关于九凤朝阳山的讨论结果这一密折，雍正帝最为关注。高其倬坚持他此前在京已向雍正帝上奏的看法，认为“此地臣向来疑其结作不确者共有五处”：一，自少祖以下所起星辰不圆秀，处处带石，气不融和；二，远朝秀而近砂粗，且有纽头转项之态，回向之情不专；三，大案外山脚，条条飞出二十余里，势不归随；四，元辰之水流破地皮，仍带刚性；五，土质有类砂石刚硬，且近所开穴土以水和之，竟丸不成圆丸，乃系砂砾，未见如此穴土。

对于以上不确者“五处”，管志宁一一进行了解答，前二项疑虑，高其倬认可管志宁的意见，二人又一同到福州林姓一名地上，看其地出五尚书，也得到证验。“则臣所疑星辰不圆秀，处处带石之处，所见不到。管志宁所见者是”。第二项疑虑，“管志宁之说亦是，臣所见者未免过于求全”。

但以下三项“不确者”，两人有的意见相同，有的意见不同。管志宁说案外之山脚远飞，乃是曜气，高其倬认为是朝山之余气。“臣近检古人之书有云：余气不去数十里，此间不是王侯地。王侯之地且然，况垣局之地乎？则臣所疑案外余气远飞之处，管志宁与臣皆以为可不必疑。”关于元辰之水流破地皮，管志宁提出可以在小水出口处以人力培补，而高其倬认为“此元辰之水乃最近穴晕，细察结作性情之处，培补之说止可改易其形象，不能改易其性情。且已博辅星性已和平，仍不脱刚意，则其气太刚。此件臣之见不同，不敢谓然”。最后：土质太硬，管志宁“说穴中之土必应胎中之土，胎中如此，穴中必如此。土色既与胎伏相应，又有圆晕可据，其色明亮而体重，乃最好之土，所见者甚多，无可疑处”。高其倬对此不认同，认为“地有中和之气，必有中和之土，况所见一二家稍好之地土皆软嫩可爱。此种粗土臣所知所见未见有如此者。况郭璞之书为地学鼻祖，历代地师杨、曾、廖、赖俱宗之不敢或异，其言穴土以砂砾为戒，此件管志宁与臣所见各异”。

高其倬最后奏称：“总之，臣以为地学千言万句，总不过令人察水土之性，审刚柔之和而已。且千里来龙到头止融八尺之穴。此等大地乃千里精粹之气钟于一穴之间，今穴水、穴土如此，臣以为刚气未脱，虽多谓之上地，臣愚昧，惟知直陈所见，以为未为大地。管志宁之地学可谓历练胜过诸人，臣不胜犬马之愿，愿令再加寻觅二四处佳地”“至易州贤德庄之地，看所画之图，管志宁所定之穴，诸处俱好，惟生定之朝山太近太高，此处是一不足之处。谨一并奏明。”²

尽管九凤朝阳山“多谓之上地”，但高其倬认为“未为大地”，连王侯之地都不能选在此，何况是皇帝的“万年吉地”！他明确提出“再加寻觅二四处佳地”，事实上否决了九凤朝阳山作为万年吉地。这对雍正帝最终放弃九凤朝阳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雍正帝当即在朱批中透露，他要再召高其倬进京，并要高做好准备：“今岁秋冬间，朕看刘世明若妥协，地方无事，意欲着你来，同管志宁商酌吉地风水之事，再面加训谕汝。但尚未定，临期候旨行。”³说明雍正帝没有就高其倬的“放弃说”立即表态，而是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命二

〈1〉 朱批奏折，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五日，《高其倬为五凤朝阳山吉地愚昧所见并管志宁学力所到之所事》。

〈2〉 朱批奏折，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五日，《高其倬奏为五凤朝阳山吉地事》。

〈3〉 雍正七年二月初八日，《福建总督高其倬奏谢格外天恩不加严谴罪愆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4辑页560，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人进京同时相度，以定取舍。

刘世明时任福建巡抚，雍正帝初步考虑让他署理福建总督事务，以便让高其倬进京。但适逢在福建会同督抚甄别知府以下官吏事宜的钦差吏部侍郎史贻直，事毕返京，已到杭州，雍正帝立即下旨史贻直不必回京，返回福州；所有应奏事件，着具折具本陈奏。并叮嘱史贻直：福建总督高其倬着于闰七月初十内外起身来京陛见。高其倬未起身之先，可将地方事务一一与史贻直详悉说明，暂令协同办理；高其倬起身之后，着史贻直署理福建总督印务，俟高其倬回任，史贻直来京。史贻直接到谕旨后折返福建⁴¹。于六月十八日抵达福州府城⁴²。

高其倬此番进京，停留时间长达九个月之久，而最核心的任务仍是相度万年吉地。期间，他最重要的意见是，放弃“九凤朝阳”山，最终选定易县永宁山太平峪作为万年吉地。

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史贻直以到闽后水土不服、心悸日增奏请回京，雍正帝朱批称闻知其情，并以喜悦的心情告诉史贻直：高其倬吉地亦选得上上之风水矣。因盛京三陵，命往观看，便道随路寻觅关外风水，或有上地，所以迟回数时，大概四月中五月初可回至闽任也。（汝）可支撑此两月可也⁴³。次年三月，高其倬回任。

三 选定易州泰宁山的原因

顺治帝的孝陵、康熙帝的景陵都选在遵化州建造，因此形成“子随父葬”的清代陵寝制度。雍正帝陵最终选址在易州，就打破了这种制度，故有学者认为，从他的性格特点及当时的政治形势看，他另立陵区，以己为祖，重在表现他是新时代的开拓者⁴⁴。这也是推测之词，不符合客观实际。

雍正帝所言“选得上上之风水矣”，事在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朕之本意，原欲于孝陵、景陵之旁，卜择将来吉地，而堪舆之人，俱以为无可营建之处，后经选择九凤朝阳山吉壤具奏，朕意此地近依孝陵、景陵，与朕初意相合，及精通堪舆之工匠再加相度，以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今据怡亲王、总督高其倬等奏称，相度得易州境内泰宁山天平峪（后改太平峪）万年吉地，实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等语。朕览所奏，其言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但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且与古帝王规制典礼有无未合之处，着大学士、九卿详悉会议具奏⁴⁵。

就以上雍正帝所发上谕而论，与前述高其倬对九凤朝阳山“未为大地”的种种缺欠论述完全吻合，绝非另

〈1〉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5辑页352—353，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钦差吏部左侍郎史贻直奏谢特命署福建总督并报自杭州起身回闽折》。

〈2〉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5辑页900，雍正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福建巡抚刘世明奏。《清世宗实录》卷八〇，七年四月己亥：福建总督高其倬来京陛见，以吏部左侍郎史贻直署福建总督。乃是谕旨发出时间，有误。《清世宗实录》，台北：华文书局出版有限公司，1968年。

〈3〉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7辑页581。

〈4〉 前揭《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五卷《清代建筑》页282。

〈5〉 《雍正朝起居注册》第四册，页3320—3321，中华书局，1993年。《清世宗实录》卷八九，所记与此略有不同，如天平峪为太平峪等。

选陵寝地址的托词。而易州西陵之风水形胜，研究者多有论述¹。此处不赘。

十八日，内阁九卿等上奏，称易州天平峪万年吉地，诚为上吉之福壤，适符盛治之昌期，地界皆与京师密迩，同居畿辅，与孝陵、景陵实未遥远。请钦派大臣，遵照万年吉地定制，择吉兴工。雍正帝下旨：大学士九卿等引据史册典礼陈奏，朕心始安。一应所需工料等项，俱着动用内库银两办理，规模制度，务从俭朴。其石像等件，需用石工浩繁，亦劳人力，俱不必建设。着该部遵行²。

泰陵于雍正八年正式开工建设。对在选址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怡亲王、高其倬，雍正帝不吝褒奖。五月，雍正帝谕称：怡亲王为朕办理大小诸务，无不用心周到，而于营度将来吉地一事，甚为竭力殚心。从前在九凤朝阳山经画有年，后因其地未为全美，复于易州泰宁山太平峪周详相度，得一上吉之地。王往来审视，备极辛勤。其所择吉壤，实由王亲自相度而得，而臣工之精地理者，详加斟酌，询谋佥同，且以为此皆王忠赤之心，感格神明，是以具此慧眼卓识也³。

高其倬已于雍正八年二月，加太子太保。三月回任福建，五月调任两江总督。九月，雍正帝以其相度太平峪吉地事宜，筹度万全，着赏给一等阿达哈哈番。管志宁、明图、任择善、海望、保德等，地理明通，赞襄勤慎，一并议叙⁴。

四 乾隆初年对“九凤朝阳山”的再相度

在初步选定九凤朝阳山为万年吉地后，雍正帝已经下旨，在两广、西南等地区采办楠木，江苏烧造金砖，铺户承办沙城砖等项。对此，档案也有较多记载。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广西巡抚金鉷奏，本年三月十九日，准广东督抚二臣咨移广东采办万年吉地楠木，议由广西一路运至湖广，臣即预檄经过各地方官敬谨小心协理接运。兹海防同知李达德运送圆方楠木共二百八十根块，另铁梨木九件。于六月十七日入广西梧州府，七月出身日抵桂林府，初六日由八十支船运送至湖广⁵。由于广南韶道林兆惠承办楠木九百八十五根块，合式堪用者仅有二百八十根块，林兆惠被革职，采办之事由布政使王士俊并接任广南韶道李可淳负责。由于时间紧迫，只好在琼州府儋州黎岐地方，开山采办五百余根块油楠，以济急⁶。因此，泰陵的主体建筑，除使用亚热带的一般楠木外，也使用了海南的油楠。

由于后来选定易州为雍正帝陵寝，因而原来运往遵化的石料、砖块等物用于东陵维修。乾隆六年修建景

1 王其亨：《清代陵寝风水：陵寝建筑设计原理及艺术成就钩沉》、《清代陵寝地宫金井研究》，王其亨主编：《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刘敦桢：《易县清西陵》，《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5年第5辑第3期。

2 《雍正朝起居注册》第四册，页3371—3373。

3 《清世宗实录》卷九四。

4 《清世宗实录》卷九八。

5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5辑页824。

6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7辑页763—765。

陵妃园寝的二十个地宫，所用石料、砖块即是九凤朝阳山存贮的¹¹。这也说明，雍正帝当初确曾打算在遵化建造其陵寝。

有学者认为，既然雍正放弃九凤朝阳山而另辟西陵，何以乾隆帝又在东陵建造裕陵？事实上，乾隆最终选定的也不是九凤朝阳山。乾隆三年，兵部尚书讷亲等援引汉唐以来帝王即位之初选择万年吉地旧典，特别查明雍正三年礼部奏请勘定万年吉地，“钦遵在案”，乾隆帝陵寝选址才正式启动¹²。而最初选址范围非常广泛，不但直隶境内的重要形胜之地，都在其列，甚至扩展到奉天¹³。直隶包括易州太平峪西南十五里西管头村北¹⁴。这一地址距离泰陵相对较近。又据塞尔登密奏，易县东北瑞麟山也作为备选地址¹⁵。此外，密云、三河、丰润、迁安等地，也都在选址范围内，说明乾隆帝也没有“子随父葬”的陵寝观念。

九凤朝阳山是否适宜建造陵寝？乾隆四年，弘历命吏部尚书讷亲、工部侍郎王纮，前往九凤朝阳山相度。经详加查勘，讷亲密奏：“奉旨相度吉地，会同王鏊（纮）等相度从前看过之九凤朝阳山，佥称山形水势，一无可取。即原经相度之管志宁，亦以为不可用。”¹⁶其后，讷亲等再次奏明，九凤朝阳山“看得山粗水急，并无结作”¹⁷。说明九凤朝阳山确实不适合陵寝建造。经过广泛选址，裕陵直到乾隆七年三月十七日，经乾隆帝钦定在东陵胜水峪¹⁸。这是乾隆帝经过很长时间筹思，特别考虑到东西两个陵区而作出的决定。嘉庆元年十二月，时为太上皇的弘历发布长篇敕谕，确定后世帝陵，“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并称此为“万世良法，我子孙惟当恪遵朕旨”。翌年春，他再次强调，“嗣后万年吉地，当各依昭穆次序，在东陵、西陵界内分建”，“我子孙务须恪遵前训，永垂法守”¹⁹。至此，似由昭穆之制取代子随父葬的陵寝选址传统。后因道光帝陵宝华峪渗水而移建于西陵，又打破了乾隆帝所订立的昭穆之制。凡此种种，说明清帝陵寝选址，并没有固定规制。该问题颇为繁复，本文作者拟专文论述。兹不累赘。

以上就雍正帝陵寝选址过程、原因及时间等问题，依据清代现存满汉档案等文献进行初步探讨。可以肯定，所谓雍正帝为回避乃父而另选吉地。是其改诏即位的“间接证据”等说法，是没有事实基础的。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宋仁桃)

11 徐广源：《清西陵史话》页13，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12 录副奏折，乾隆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兵部尚书讷亲等奏为谨遵旧制恭择吉壤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3 录副奏折，乾隆七年三月初七日，《大学士鄂尔泰等遵旨酌议胜水峪万年吉地事》。

14 朱批奏折，乾隆四年二月初四日，《讷亲、海望奏为新授杭州织造伊拉齐通晓风水请带令同往太平峪查看吉地事》。

15 朱批奏折，乾隆四年十二月初二日，《总理工程钱粮事务国子监司塞尔登奏为看得易县东北瑞麟山万年吉地敬谨复加相度事》。

16 朱批奏折，乾隆四年三月初七日，《吏部尚书讷亲奏为奉旨相度三河等处吉地情形事》。

17 朱批奏折，乾隆四年四月初一日，《吏部尚书讷亲等奏为相度密云遵化吉地情形事》。

18 《清高宗实录》卷一六三，乾隆七年三月丙子，台北：华文书局出版有限公司，1968年。

19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九五，嘉庆元年十二月癸巳；《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九六，嘉庆二年三月乙卯。